

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综述

一、评价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整个来说,在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邓小平也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大多数学者对这一结论表示认同,其中以沙建孙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衡量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正确,其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它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而且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②。还有学者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比较中,指出我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在农业改造方面,苏联从一开始就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一开始就造成严重的混乱。而我国的农业集体化则是在大多数农民拥护的情况下实现的,比较成功。在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强制剥夺的办法,而我国则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③。对于改造中存在的问题,一些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总结,指出改造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但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改造中的失误也不是形成中国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唯一原因^④;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只是具体做法欠妥,不是根本指导方针的错误,失误也是探索前进中的失误^⑤。

与此相反,有一部分学者对改造持否定的观点。如:张欣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促成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形成,打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践的进程,奠基了“大过渡”理论的现实社会基础,直接把中国导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社会主义乌托邦^⑥。陈绪林也指出:“三大改造”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层面的把握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的欠缺,轻“主体”而重“两翼”的实践使人们在长期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入了重社会主义而轻视现代化的误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⑦。

还有一部分学者持“折中”的观点,既充分肯定改造的方法、步骤和取得的成绩,又指出要求太纯、步伐太快等严重错误,因此遗留下了一些社会问题。

二、原因及历史必然性

关于改造的原因和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近五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主流观点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社会主义改造举措并不是头脑发热的主观臆想,而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生产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② 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1期。

^③ 邢丽雅,于耀洲:《试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教训》,《理论探讨》2002年第6期。

^④ 黄金家,蔡天新:《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郑蕊:《对社会主义历史功绩的探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⑥ 张欣:《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作用的再认识》,《台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⑦ 陈绪林:《试论三大改造的失误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时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维持新政权；工业化战略的提出，使我国必须对与工业化不相适应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外在原因^①。针对有人认为改造搞早了、搞偏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韩亚光专门撰文，逐条批驳^②。张家芳则从阶级阶层因素方面对此作了剖析，指出：由于建国初期，企业工人盼望改造，干部阶层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的反限制斗争客观上推动了改造，农民、小资产阶级总体上愿意接受改造，知识分子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拥护改造，所以，这场改造是干部阶层整合各阶级阶层人民利益的必然结果^③。

也有部分学者否认改造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改造只是通过强制命令的手段进行的，并不是当时的客观需要。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也并不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它的发动与实践主要是由超前的主观意识因素促发的，而且在实践中又产生，偏差，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左”倾错误。所以二三大改造搞早了、搞快了，搞急了^④。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出于对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美好愿望，以及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理解上的偏差，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忽略当时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过早消灭了私有经济^⑤。

三、失误的原因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四过”，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其成因。如：公方海、姜福金从主观认识上探索其根源，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的认识上偏离了同时并举的根本方针，存在违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基本规律的倾向；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忽视了个体经济在一定条件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和不利方面，忽视了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和有利方面^⑥。刘波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在认识上，把社会主义起点模式看成是目标模式，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还存在积极作用，而且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拔高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在环境方面是由于建国后顺利恢复和发展的国内经济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此外，还有毛泽东个人对现状的忧患意识和对前景的超然心情^⑦。

孙代尧从工业化背景方面分析了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认为这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战略全面推行的逻辑结果^⑧。

陈国清在分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失误的原因时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急躁冒进，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或某位党的负责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当时工业发展与落后的农业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时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观察形势上的失误和地方各级领导人大哄大嗡的人为造势，都是促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四过”的重要因素^⑨。

^①梁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1期；刘建云，陈士义：《论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战略的形成》，《理论界》2005年第1期；黄金家，蔡天新：《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②韩亚光：《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前沿》2002年第1期。

^③张家芳：《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阶级阶层因素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

^④綦军：《对“三大改造”历史必然性的思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⑤刘秀萍：《三大改造的偏失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

^⑥公方海，姜福金：《欲速则不达：“社改”后期偏差的主观认识根源探析》，《党史纵横》2002年第9期。

^⑦刘波：《试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转变原因》，《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2期。

^⑧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2期。

^⑨陈国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急躁冒进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四、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研究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仍然是目前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从近五年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已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意见分歧较小。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并不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二者都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体现在:首先,社会主义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造是改革的基础。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同,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使今天在改革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在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调整。第三,社会主义改革是改“三大改造”中偏差的东西,使之更完善。^①

有的学者提出“创新说”和“深化说”,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在继承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和深化。如:朱小玲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既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缺点和偏差的拨乱反正,更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体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业合作化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是对所有制结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深化和发展^②。

五、与社会心理变迁的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必然会引起社会成员的巨大的心理变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关注。

师吉金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没有进行公开的和大规模的反抗,但其心理是很复杂的。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其中有些人是真心拥护,主动要求社会主义改造,愿意靠拢国营经济,也有些人是在无可奈何中接受改造,另外还有人借社会主义改造丢包袱。第二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犹豫、彷徨。他们认识到改造是大势所趋,但又不甘心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第三部分人悲观、失望、不满。到了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③。董宝训认为出于不同的动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应程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或在表面上积极响应,或被动地顺从,或消极地抵触,或顽固地抗拒。但总体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是被迫的,是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足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生存需求而作出的被动回应^④。

朱智宾在分析农民心理时指出:封建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民是在需要与压力、利益与政策的冲动下接受改造的。土改之后,农业生产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受个体经济的极大限制。由于生产规模小,势单力薄,贫苦农民在生产和经营中存在许多困难,生活窘迫,所以有互助合作的需要。倾向于单干的农民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另外,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入社农民的政策,以及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大力宣传也成了农民积极接受改造的动力^⑤。

总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从目前的研究成

^①周越,贺蓉南:《略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其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年第10期;陈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7期;黄金家,蔡天新:《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胡映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刘振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朱小玲:《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与改革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7期。

^③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④董宝训:《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文史哲》2004年第4期。

^⑤朱智宾:《农业合作化迅速完成的农民心理分析》,《世纪桥》2003年第3期。

果看,仍有一些较为一些薄弱的环节。如党在短短七年时间内迅速地完成如此大的社会变革,对其所运用的思想工作方法研究还很不够。再如总结经验教训时,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以至降低了研究的实践性。此外关于地方性的个案研究,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马慧芳、雷甲平:《近五年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综述》,载《历史教学》2006年6期。